

敦煌出土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

田中公明¹ 著 刘永增² 译

(1.日本东方研究会; 2.敦煌研究院考古所, 甘肃 敦煌 736200)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以大英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50 Ch 0074 文献为中心,对吐蕃占领敦煌前后的敦煌及周边的八大菩萨做了图像上的解释。同时,结合印度、西藏以及瓜州东千佛洞保存的八大菩萨曼陀罗和藏经洞出土的相关密教文献做了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以为此卷文献是吐蕃占领下的公元 8 世纪末叶到 9 世纪中的作品,内容当是印度、丝绸之路地区流行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

关键词:八大菩萨;毗卢遮那

中图分类号: K87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0-4106(2010)05-0059-09

Vairochana and the Eight Bodhisattva of the Gārbhahātu Family

Tanaka kimiak, trans: LIU Yongzeng

(1. Oriental study Association of Japan 2.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Based on a careful study of Stein Painting50 Ch 0074 remain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ing an iconographic explanation for the Eight Great Bodhisattvas of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in Dunhuang Grottoes and another Buddhist site nearby area and at the same time,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both on iconography of the Eight Bodhisattva found in India, Tibetan and the Eastern Cave of Thousand Buddhas in Guazhou and the Tantric texts in the Hidden Library of Dunhuang.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an opinion that Stein Painting Ch 0074 should belong to art work of later 8th century to mid 9th century of period of Tibetan Occupation in Dunhuang, and icon presentation of Stein Painting50 Ch.0074 was popular Buddhist art motif of Vairochana and the Eight Bodhisattva of the Garbhadhātu family that popular along the Old Silk Road at that time.

Keywords: Eight Bodhisattva; Vairochana

收稿日期:2008-09-20

作者简介:田中公明(1955 —),男,日本福冈县人,日本东方研究会研究员,主要从事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美术研究。

译者简介:刘永增(1954 —),男,河北省清苑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 序 言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的佛教美术,以飞天曼舞的极乐净土和本生故事等常见的佛教作品著称于世。但是,在藏经洞中也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密教绘画。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美术品中,斯坦因收集品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存于当时的英属印度),伯希和收集品收藏于巴黎吉美美术馆。

这些流行于当地的密教美术,是8世纪后半叶以后至藏经洞封闭即公元11世纪初叶之前的作品。在密教流行的盛期(9世纪),敦煌一度受吐蕃统治,那么,过去的敦煌密教,是曾经繁荣的汉地密教还是其后导入吐蕃的西藏密教呢?或者是两者相互依存并且交流发展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敦煌密教一个单方面的问题,在论述同处相同政治背景下的丝绸之路东部以及整个河西走廊的文化时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英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50 Ch.0074 文献,被认为是与吐蕃占领相关的作品。本文以该作品为中心,对吐蕃占领前后的敦煌及其周边的密教美术作一论考。

二 作品的概要

本作品高95.0×63.5cm,绢本着色,中央画禅定印菩萨形坐像,左右分别画4身计8尊菩萨像,其中的6尊存有吐蕃文尊名,上段2尊的尊名因剥落难以判读。

根据书写的尊名,本尊右侧(面向画面的左方)上数第2尊菩萨像为地藏,第3身菩萨像为观音,左侧(面向画面的右方)上数第2身为普贤,第3身为除盖障。右侧第3身菩萨左手持梵筐,在图像学上,较之观音文殊的可能性更大(图1、图2)。

这些菩萨,从亚洲各地遗存的一系列菩萨来看可推定为八大菩萨。八大菩萨有多种组合,一般的指观音、金刚手、文殊、弥勒、虚空藏、地藏、除盖障和普贤8尊。顺便应提及的是,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除了有与八大菩萨相关的藏译经典《佛说大乘八大曼拏罗经》残片外,还出土了言及八大菩萨的赞文。说明了在吐蕃占领下的敦煌也曾流行过八大菩萨的信仰。

本作品的主尊当初被称之为观音,由于在敦煌出土的作品中,有身穿羯磨衣作禅定印的观音,所以说这种说法并非不能被接受。但是在图像学上,禅定印是阿弥陀如来的特征印,下部的鹅鸟也使我们联想起极乐净土。因此,比定为阿弥陀八大菩萨的说法似更为准确。此外,在西藏也曾流行被八大菩萨围绕、结禅定印的阿弥陀如来极乐净土图,所以说,笔者是一直支持这一解释的。

不过如后述,在西藏的腹地发现了吐蕃时代的浮雕摩崖佛,这身像是一面两臂结禅定印的毗卢遮那佛,即胎藏大日八大菩萨,所以说有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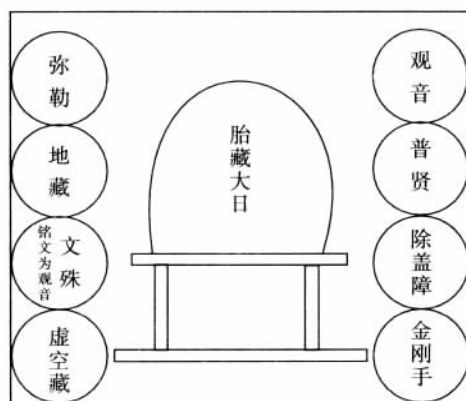


图1 胎藏大日与八大菩萨

(Stein painting No50,大英博物馆藏 OThe BritishMusoum)

弥勒	阿 弥 陀 / 大 日	观音
地藏		普贤
观音 → 文殊		除盖障
虚空藏		金刚手

图2 Stein painting 50(Whitfield?)

①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 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1卷“敦煌絵画”(講談社,1982年)第309页及其他著作。但是许多论文中以之为“文殊”,实际上书写的是“观音”spyan ras gzig(sic) dban phyug。

赖富本宏《密教仏の研究》(法蔵館,1990年)一书也对本作品的八大菩萨作过探讨,请参照该书第628—629页。

现发现有Stein No.317、Pelliot No.104()等数件写本。

救苦观音菩萨坐像(吉美美术馆 EO.1175)。

关于西藏的极乐净土图请参照田中公明著《黄金曼陀罗》(崎本仁彦,1996年)。

纠正过去的一些解释。

又,本尊台座左右画狮子样的动物,如过去指出的那样,坐狮子座的毗卢遮那或大日如来在亚洲各地都有许多遗存。

以下,就本作品成立的吐蕃占领敦煌前后,在亚洲各地制作的佛教美术中与本作品相类似的图像作一新的探讨。

三 印度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

长期以来,在佛教的故国印度有无胎藏大日不为人们所知晓,近年发现了数身雕像,被人们视为胎藏系密教图像的原像而备受注目。其中以佐和、赖富两教授比定的奥利萨的拉托纳祇厘(Ratnagiri)第1祠堂像最为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是雕像光背左右各浮雕有4身八大菩萨。关于该作品的八大菩萨配置,赖富教授有过详细的研究(图3)。

在同是奥利萨的乌达雅祇厘(udayagiri)佛塔北面,也发现了似为胎藏大日的佛像。据研究,

普贤 → 虚空藏	大日 / 释迦牟尼	虚空藏 → 地藏
弥勒		金刚手
观音		文殊
地藏 → 普贤		除盖障

图3 奥利萨的八大菩萨 (Malandra,据赖富说补正)

本像以八大菩萨中的两尊为胁侍,与佛塔东、南、西三面阿閼、宝生、阿弥陀三尊像两侧安置的胁侍菩萨共同构成八大菩萨。日本东寺五重塔及醍醐寺五重塔门扉绘制的八大菩萨配置与此一脉相承,具有很高的价值。

此外,在西北印度埃罗拉第12窟,结禅定印的如来像四周也雕有8尊菩萨像,很可能也是胎藏大日与八大菩萨的作例。赖富教授对埃罗拉的作例是否是胎藏大日持保留态度,认为也有可能是结禅定印的释迦如来。最近,马兰多拉女士(Geri H. Malandra)发表了饶有兴味的新说。

马兰多拉女士主张,埃罗拉佛教窟的代表作第11、12窟中所见本尊佛和八大菩萨的组合与第12窟所见条形九尊曼荼罗基本上是相同的。

马兰多拉女士认为,结触地印的如来像是释

迦或阿閼(图4),与之相反,结禅定印的如来像当为毗卢遮那。在第12窟中完成的埃罗拉的诸尊配置,只是将第12窟壁画中的条幅九尊曼荼罗以礼拜像的形式展开了而已。

接着马兰多拉女士作结论说,将这些造像与奥利萨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梅都支提(Chandi Men-

观音	释迦牟尼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普贤		观音
金刚手?		除盖障
地藏?		虚空藏

图4 埃罗拉第12窟3层第1(Malandra)

dut)相比较,从地理位置上讲,奥利萨的初期造像与埃罗拉后期佛教窟的主尊配置当是基于同一文本。

遗憾的是,马兰多拉女士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关于西藏语和汉文资料,她混淆了《大日经》系的行怛陀罗和《金刚顶经》系的瑜伽怛陀罗。但是,埃罗拉的后期佛教窟的主尊配置,被解释为

朴亨国《七獅子蓮花座の圖像について——韓国統一新羅後期の石像毗盧遮那仏座像を中心に》(《密教圖像》第14号)。

关于印度的作例,请参照宫治昭《インドの大日如來の現存作例について》(《密教圖像》第14号)。但是如宫治昭教授所言,这其中不包含西藏和尼泊尔系的作品。作为西藏内部的作例,除本章列举的以外,在布达拉宫的响铜殿收藏有数例印度或克什米尔制金刚界大日及五佛像。著者监修的日语版《ポタラ宮の秘宝》(アジア文化交流協会)中载有照片,但迄今尚未发现有胎藏大日的作例。

佐和隆研编《密教美術の原像》(法蔵館,昭和57年)卷头图版7,第100、126页。但是,佐和博士列举的中国腹地万佛峡的例子,是本章第4所列安西榆林窟之误。

赖富本宏《密教美術の源流原像》(法蔵館,1990年)图65—65,第612—615页。

见上引赖富本宏著作,第618—620页。

赖富本宏在《密教美術の源流——インド密教美術》《密教美術大観》第1卷“両界曼荼羅”(朝日新聞社,1983年)中,对阿閼、阿弥陀两尊的胁侍菩萨进行了图像的比定研究。

Malandra:Unfolding a Malandra,the Buddhist Cave Temple at Ellora,New York,1993.

关于印度尼西亚八大菩萨的研究,请参照松长惠史《チャンティ・ムンドウの八大菩薩》(《密教文化》174号,但是,松长氏关于八大菩萨的比定与赖富说不同。

见上引Malandra著作第121页。

展开的曼荼罗“The Mandala Unfolded”的新说倒是值得倾听的。

四 瓜州榆林窟的卢舍那佛与八大菩萨作例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在与敦煌临近的瓜州榆林窟第25窟,也发现了吐蕃占领期结禅定印的菩萨形卢舍那如来与八大菩萨。自斯坦因以来,这个石窟被认为晚于10世纪,但是由于在北壁发现了吐蕃语铭文,因此可以说该窟开凿于吐蕃占领期的前期(776—781)。

本尊头戴宝冠,发垂两肩,裸上身着胸饰和条帛,着腕钏,两手于膝前结禅定印。这些图像学上的特征,与Stein Painting 50大体一致。又,台座中央及其左右画狮子三头。

此外,在壁面上,该窟佛像旁还题写有汉字和吐蕃文字的尊名,本尊尊名不是大日如来,而是“清净法身卢那舍佛”。它是胎藏大日和丝绸之路地区流行的《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相融合的产物。

在本尊卢舍那佛左右各画4身八大菩萨,其中左侧(面向壁画的右侧)的4身由于壁画受损已不存在。据题写的尊名,右侧4身中上段两身是虚空藏和地藏,下段两身是弥勒和文殊。

又,4身菩萨的服制和发型类似,唯文殊菩萨不是高髻,而是小型的五髻。如上述拉托纳祇厘(Ratnagiri)第5祠堂像,八大菩萨中唯文殊的发髻与其他不同,可知是保留了印度图像的特征。还有,在弥勒菩萨的宝冠中画有小型的佛塔,这也是印度的传统图像。另外,虚空藏菩萨也与其他菩萨不同,身色呈绿色,这与Stein Painting 50中比定为虚空藏菩萨的左侧最下段的菩萨一致。

五 胎藏大日八大菩萨佛龕
(尼尔松·阿提金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藏)

此外,在同样的丝绸之路地区,也发现了携带用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佛龕(图5、图6)。佛龕高30cm,宽35.5cm,为横向三连式。出土地不明,是在质地细密的木材上精雕细刻的檀像,使我们想起传空海请来的“枕本尊”雕像。又,在佛龕的背面写有西藏文字书写的铭文byan chub,可以认为,该像制作于吐蕃占领下的丝绸之路地区。

本尊头戴宝冠发垂两肩,裸上身着胸饰、条帛,两手于膝前结禅定印。又,台座中央及左右刻动物,其中左右两侧明显是狮子,而中央的动物好像不是狮子而是大象。

在本尊左右纵向配置4身合计8身菩萨,这和其他的作例一样,可推定为八大菩萨。这些菩萨均头戴三山冠,唯左侧第3段的菩萨头戴五髻。如果将这身菩萨认定为文殊菩萨的话,就和瓜州榆林窟相同,保存的也是印度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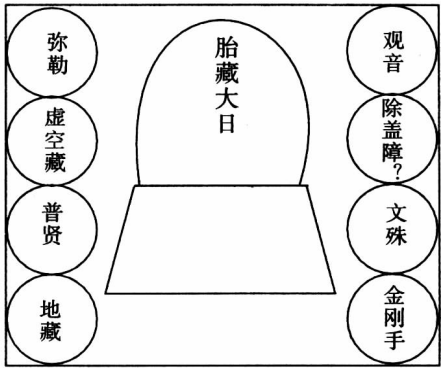


图5 胎藏大日与八大菩萨 (Nelson-Atkins 美术馆藏)

弥勒	胎藏大日	观音
虚空藏		除盖障?
普贤		文殊
地藏		金刚手

图6 胎藏大日八大菩萨佛龕

对此,Stein Painting 50中文殊也和其他的菩萨着同样的发冠,较之本佛龕瓜州榆林窟像的时代略显晚些。

本尊下方画的似乎是施主比丘,空中的二菩萨中,面向雕像的右侧一尊为比丘摩顶,左侧一尊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平凡社,1990年)第171页,指出的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与论文中的山口说(详见)不同。

译者注:在榆林窟第25窟的八大菩萨曼荼罗中,为书写汉藏两种文字,在各尊像的旁边预设了横竖两种题记栏。但是,仅在纵长的题记栏中书写了汉文尊名,横长的题记栏中没有书写任何文字。

请参见前掲宫治昭《インドの大日如来の現存作例について》第10页。

从来都认为,用西藏语书写的铭文为“菩萨”,但是根据照片,只有相当于“菩提”的byan chub,而没有相对于“萨埵”的sems dpa。仅依“菩提”二字就将之比定为本尊的尊名有些牵强,也有可能是收藏者的名字。

作水瓶灌顶状。

左右门扉分三段雕造，上段刻如来形佛像及二侍者，中段刻四天王，下段刻二大明王。又，本作品两侧所画四天王与西藏的传统图像有别，二大明王亦与汉人系统的作品样式相近。

有趣的是，关于胎藏大日与八大菩萨的图像，与前述Stein Painting 50、瓜州榆林窟像的一部分相一致，可以看出，在吐蕃占领下的丝绸之路地区，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图像已相对程度地扎下了根。

六 昌都和贝沟的摩崖佛

在当时属于吐蕃领地的东部西藏，从康区的昌都发现有结禅定印的胎藏大日及八大菩萨摩崖像。作品中央为较大的禅定印菩萨形本尊，其光背左右分别雕刻4尊菩萨以构成八大菩萨。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照片以观察出它的细部样式和八大菩萨的配置。但是，和其他作例一样，在本尊台座的左右雕有狮子。

此外，据说唐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在此地停留，刻7肘 弥勒像和被比定为丹玛札（IDan ma brag）的《普贤行愿赞》，地名昌都也代表着“弥勒像前”的意思，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弥勒的摩崖佛像。

又，根据恰布拍尔（Chab spel）氏转写的铭文，该像是在赤德松赞治下的申年之夏，益西央（ye shes dbyangs）为祈念王之长寿造立。

又据山口瑞凤博士的解释，赤德松赞（通称为塞那累）王治下的申年仅公元804年 一见，可知本像造立于公元9世纪初叶。

对此，同处康区，现青海省结古镇地区（玉树县）的贝沟（'Bis mdo）也有结禅定印的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摩崖佛。和昌都同样，也有人将此地比定为丹玛札，当地的人们都认为，文成公主曾在此地停留，并雕刻了摩崖佛弥勒。

贝沟摩崖佛像是高7m的巨像，现收藏在文成公主庙或被称作为大日如来堂（rNampar snanmdzad lha khan/gtsug lag khan）内。此外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或为出土品，或为近年新发现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造像当初的尊名都无从考证，对此，本作品长期以来作为大日如来被人们崇信却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人们公开了该像的照片，遗憾的是造像周身裹覆着奉纳衣，面部还施有金箔，无法了解

到当时的雕刻情况。头光呈纵长的椭圆形，说明了造立之初曾戴有较高的发髻冠。像这样的例子还见于上述拉托纳祇厘（Ratnagiri）第5祠堂像以及瓜州榆林窟像。

如此，虽然依据照片无法确认出贝沟摩崖佛造像之初的尊容，但是，最近中国发表的论文中非常详细地报告了该像的像容表现。据此知像高25肘，身着报身装饰，菩萨形。又据照片可知它与昌都像同样，莲台下刻二狮子（其中一头正面，一头为侧面）。

八大菩萨在本尊左右分二段雕刻，右上段为普贤、金刚手，下段为文殊、除盖障，左上段为弥勒、虚空藏，下段为地藏和观音（图7）。这种配置虽然和瓜州榆林窟像不完全一致，但却十分近似。

又据论文转写的铭文，为祈祷吐蕃王赤德松

弥勒	虚空藏	大日 / 释迦牟尼	普贤	金刚手
地藏	观音		文殊	除盖障

图7 贝沟摩崖佛（《中国藏学》）

① Amy Heller《Images at IDan-ma-brag》（Tibetan Studies, Oslo, 1994），该论文虽然已经对拉托纳祇厘（Ratnagiri）和瓜州榆林窟进行了论述，但是，这些作例的存在，笔者在学术会议上已有论及。

译者注：肘是绘制佛画时的长度单位，一指量约合四公分，十二指量为一肘。

见前注Heller博士论文。论文中希望全文掲載Chab spel转写的铭文，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收载在Tibetan Studies的附录中。

见前注Heller博士论文。论文说有可能是816年。但是，据山口瑞凤《吐蕃王国佛教史》（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第3号）一书第23—24页，公元815年该王已经逝去，因此则没有了804年以外的可能性。

《甘肃藏传佛教寺院》（西宁，1990年）第309页。

《青海文物》（北京，1994年）图版161与《中国藏族石刻艺术》（北京，1995年）第90—97页载有照片。

gNa' gon dkon mchog tshe brtan & Pad ma'bum; Yul sul khul gyl bod btsan po'i skabs kyi rten yig brag brkos ma 'ga'（藏文版《中国藏学》1988—4所收）。又，将该论文所载八大菩萨的配置图与《中国藏族石刻艺术》所收照片作一比较，有几点令人费解。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择日再述。

赞的长寿，与上述昌都施主为同一人物的大译经官益西央(ye shes dbyangs)于戌年造立。由于赤德松赞王治世时的戌年仅只有公元806年一见，因此本像造立于昌都像后两年。

此外还发现有石刻藏译《普贤行愿赞》，论文中有全文的转写。字母组合为逆向，mi记为myi，呈古式的书写形式。再添后字的da被省略，书法与赤德松赞王治下公元814年制定的《钦定译语》大致相同。又，末尾记有赤德松赞王时代的译经官智军(Ye shes sDe)之名，因此不可能是文成公主使人雕刻的。它和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同样，属于公元9世纪初叶的作品。

七 吐蕃时代的西藏造像例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吐蕃时代的中部西藏，在吐蕃时代后期，以大日或毗卢遮那为本尊，左右配以八大菩萨的造像有相当的数量。

遗憾的是这些造像大部已经损失，现多为后代的补作。根据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作品尚可复原出它的配置形式。其中桑耶寺的乌策大殿，是实现了占领敦煌的弃松德赞王建立。故与本稿所介绍的作例年代相近。

乌策大殿模仿须弥山世界所造，大殿由3层组成，是危耸在桑耶中心的乌采(中峰)。八大菩萨分布于3层中心佛殿的各处。

即乌策第1层本尊安置释迦如来灵像，左右为八大菩萨和喜吉祥菩萨(dGa' ba'i dpal)、维摩居士、不动、降三世二大明王，合计13身。第2层以毗卢遮那为本尊，前面有三世佛和药师、阿弥陀、八大菩萨等，第3层安置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

据西藏古典史书《王统明示镜》(rGyal rabs gsal ba' me lon)，1层八大菩萨的安置情况为，以释迦如来为本尊，右侧为弥勒、观音、地藏、(虚空藏)，左侧为普贤、金刚手、文殊和除盖障。

第2层的八大菩萨的安置情况不明，第3层本尊为“面一切”即四面毗卢遮那。八大菩萨在本尊四方各配两尊。这可以说与前述乌达雅祇厘、东寺五重塔以及梅都支提(Chandi Mendut)的形态相类似。

又，在埋藏系史料《莲花遗教》(Pqd ma bka' than)中虽然没有记载八大菩萨的配置状况，但是，作为桑耶创建之初的诸尊安置状况，与《王统

明示镜》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述。

因此，可以确知，在吐蕃占领前后的中部西藏，本尊如来与八大菩萨的组合，是佛堂尊像配置的基本形式。

而且这种配置与乌策大殿的各层有着共同点，第1层所见释迦如来与八大菩萨的构成，到了第2层变成了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在第3层则成了四面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各层间都有着变化。

如此3层间的本尊与八大菩萨的配置构成，使我们想起了埃罗拉第12窟像。在埃罗拉第12窟，第1层本尊，是被推定为曼荼罗的禅定印如来像毗卢遮那(图8)。对此，第2、3层的本尊为触地印如来，如来的台座上刻有地天女和无能胜明妃，很明显给人的印象是降魔成道时的释迦(图9)。因此，它和将释迦安置在下层的桑耶寺上下相反，但在整体构成上却十分相似。

现在的西藏，触地印释迦和八大菩萨的组合

观音	毗 卢 遮 那	虚空藏
普贤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除盖障		地藏

图8 埃罗拉第12窟第1层(Malandra)

关于这个问题H.E.Richardson:The Cult of Vairocana in Early Tibet, Indo-Tibetan Studies, Tring 1990中载有有益的见解。但是该论文中没有区别胎藏和金刚界《恶趣清净怛陀罗》的一切智毗卢遮那。另外，对于该论文后半有关大昭小昭寺的创建年代的考证笔者也不能苟同。

其中第3层在“文革”中遭到了破坏，现为近年的重建。

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北京，1981年)第207—208页。又此处缺少虚空藏的记述。为了稳妥起见笔者参照了Indo-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Series, Vol.132 (Rewalsar, 1985)所收本，依然不见有关虚空藏的记载。可是缺少了虚空藏的1层所安置的尊数就不足13尊，也就产生了矛盾，于是不能不说是本尊的右侧曾安置过虚空藏。

在这种场合下，有结智拳印的金刚界大日四面像和结禅定印持法轮《恶趣清净怛陀罗》的一切智毗卢遮那两种可能性。

Pad ma bka'than(成都，1987年)第508—509页。

观音	释迦牟尼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普贤		虚空藏？
地藏？		除盖障
金刚手？		观音

图9 埃罗拉第12窟第3层(Malandra)

是佛堂尊像配置的基本形式。此外,在西藏佛教圈内,虽然一些寺院供奉着和观音、阿弥陀相关联的本尊,但是,中心佛堂以释迦如来为本尊的寺院占压倒性的多数。正因为如此,吐蕃时代建立了许多以毗卢遮那为本尊的寺院,其中有许多都是和八大菩萨相组合的。这一现象也许是受到了当时丝绸之路地区流行的尊像配置的影响。

八 《伴眷属毗卢遮那赞》

在敦煌出土的西藏语文献中,《伴眷属毗卢遮那赞》(rNam par snan mdzad 'khor dan bcar pa la bstod pa)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该文献在斯坦因收集品中有两件,伯希和收集品中有一件,但均不是完本。其中斯坦因的二文献均是开始部分相临近的小残片,而伯希和(Pelliot) NO.108完整地保留了4对页,是可以复原全文大半的珍贵资料。

赞文在赞颂住色究竟天毗卢遮那偈后,依①观音、②弥勒、③虚空藏、④普贤、⑤金刚手、⑥文殊、⑦除盖障、⑧地藏的顺位赞颂八大菩萨,之后赞⑨维摩、⑩宝吉祥Rin cen dpal、⑪降三世,自此后的部分不存。如果第⑩宝吉祥的与喜吉祥相同,那么⑪降三世之后当是⑫不动的赞文。若如此,这样的尊格选择与上述桑耶寺的尊像配置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这些赞文除了言及①观音是白色身以外缺乏图像学上的记述,还不能根据这些记述了解八大菩萨的图像。但是却可以确知,在吐蕃占领下的敦煌,以八大菩萨为毗卢遮那眷属的方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九 八大菩萨的系统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大英博物馆藏Stein Painting 50中所见本尊佛和八大菩萨的组合,在吐蕃占领前后的敦煌及其周边地区曾有广泛的流传。

如上所述,在吐蕃的根据地中部西藏与东西藏,都有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相组合的遗存。将这些遗例进行一下分类,像曼荼罗似的几何形排列的八大菩萨的配置仅见于埃罗拉的条幅雕刻,本尊左右各列4尊,配置八大菩萨的例子占压倒性多数。

关于这些作品的配置,拉托纳祇厘(Ratnagiri)第5祠堂和Stein Painting 50、胎藏大日八大菩萨佛龕,以及昌都石窟,是在本尊左右各列4尊,以纵一列的形式配置。与之相反,瓜州榆林窟与贝沟石窟为左右上下二段的形式。又如埃罗拉第10、11窟(图10),八大菩萨的各尊分别侍立于本尊的左右,这种形式与桑耶的乌策第1、2层的配置相类似(图11、图12)。

可是几乎是同时,同一施主发愿的昌都与贝

观音	释迦牟尼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地藏 → 普贤		虚空藏 → 地藏
普贤 → 虚空藏		除盖障

图10 埃罗拉第11窟八大菩萨(根据赖富说补正)

观音	释迦牟尼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普贤		虚空藏
地藏		除盖障

图11 埃罗拉第11窟第2层第1(Malandra)

观音	释迦牟尼	金刚手
弥勒		文殊
地藏		虚空藏
普贤		除盖障

图 12 埃罗拉第 11 窟第 2 层第 2(Malandra)

沟像,其配置形式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其说是系统的差异,倒不如说是由于雕刻摩崖佛的岩石形状以及佛堂内部空间大小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也就是说,在瓜州榆林窟,本尊左右横长的壁面上分二段绘制了八大菩萨,而携带用的佛龕,要雕刻八大菩萨不得已而采用了纵向排列。因此,根据八大菩萨的配置形态来确定每个作品的系统是不妥当的。

对此,八大菩萨中的哪一尊配置在本尊右侧,哪一尊配置在本尊左侧,这种个别的配置方法,在确定这些作品相互的亲近性和系统上较为有效。

本文介绍的作品中,关于逐个菩萨的尊名比定,已由赖富、韦陀(Whitfield)和马尔多拉(Malandra)各氏试行解说。但是,赖富、马尔多拉两说比定的观音、金刚手、文殊、弥勒、除盖障5尊一致,地藏、虚空藏及普贤3尊不同(请参照卷末八大菩萨配置表)。

笔者在两说中采用了赖富教授的比定结果,其理由是瓜州榆林窟的八大菩萨,虚空藏和记有尊名的菩萨手持持剑。而且在敦煌,还发现有手持三蕾的普贤菩萨(吉美美术馆MG.17770),这些材料都对赖富说予以支持。因此,以下以持剑的菩萨为虚空藏,以持宝珠的菩萨为地藏,以持三蕾的菩萨为普贤,结合马尔多拉氏的比定给予补正。

此外,赖富教授分析奥利萨八大菩萨的结论是:“八大菩萨中,居首的是观音和金刚手两尊,被配置在本尊的右左两侧。”而“文殊和弥勒,据此前诸例被固定在如来的右侧和左侧,但是,现阶段还不知道其中的理由”。

这一见解在近代西藏的一些作品上可以说也并非不妥当,但是,本文所介绍的作品中,未把所有的都和这一原则相吻合。

在以上介绍的诸例中,图像上可明确地判别,唯一记有尊名的是瓜州榆林窟像,主尊右侧(面向壁画的左边)的4尊是虚空藏、地藏、文殊和弥勒。左边的图像虽然无法得到确认,但是,剩下的4尊无疑是观音、金刚手、普贤和除盖障。

根据韦陀教授比定的Stein Painting 50的八大菩萨,即如果将手持梵筐的观音拟定为文殊,本尊左右配置的菩萨选择则与之完全一致。而且这两个例子均是观音、金刚手居左侧,文殊、弥勒居右侧。如此,赖富教授于奥利萨得到的结论与敦煌不相符合。

对此贝沟摩崖佛右侧的4尊中仅将文殊移到了左侧,随之观音则移到了右侧。又,桑耶寺的乌策配置,本尊左右四尊的配置也与之完全一致。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敦煌文献,根据《伴眷属毗卢遮那》中八大菩萨的顺位推定,①观音、⑤金刚手,因此①—④居本尊右侧,⑤—⑧居本尊左侧。根据这个配置,④普贤居本尊右侧,⑧地藏居左侧,与贝沟和桑耶寺仅稍有不同。但是与根据赖富说补正的埃罗拉石窟八大菩萨相一致。

又,依据《八大菩萨赞》的八大菩萨配置次第,①虚空藏、②弥勒、③观音、④地藏、⑤普贤、⑥金刚手、⑦文殊、⑧除盖障。与上述同样,①—④居本尊的右侧,⑤—⑧居本尊的左侧,与桑耶和贝沟的作例一致。是可推定,这应该是吐蕃的通例。

这种吐蕃式和丝绸之路式的配置,仅只是观音和文殊的左右交替,由于这一尊的交替,观音和金刚手,文殊和弥勒在相互对称的位置上作了移动,与赖富教授的原则相一致。而且现代西藏八大菩萨的配置法,正可以说是接受了这一变动的影响。

在Stein Painting 50中,图像学上表示文殊特征的菩萨中以西藏语记尊名“观音”,如果将这一尊格的菩萨不视为文殊而是观音,就与西藏通行的八大菩萨的配置相一致。因此,这一尊名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误记,似可推定,应该说在吐蕃占

请参见前掲佐和隆研编《密教美術の原像》(法蔵館,昭和57年)第123—124页。在西藏,文殊和弥勒以对称位置出现,据说是由于文殊和弥勒象征中观和唯识两大学派。

其后赖富教授在《密教仏の研究》(第630页)中,分析了西藏的作例,得到了大致统一的结论,但是关于文殊和弥勒,在西藏弥勒多居(本尊的)右侧。

Stein No.360. .

领之前的丝绸之路地区就流行有八大菩萨图像,其后又根据其他途径传入的吐蕃式配置法给予了一种错误的解释。

十 结 论

如上所述,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的组合,不仅是在吐蕃占领下的8—9世纪的丝绸之路地区,而且是在远至印度,乃至吐蕃本土的中部西藏都广为流行的一种尊像配置。

对此,阿弥陀如来与八大菩萨的组合,公元9世纪时已有流行。因此,不能像马兰多拉女士那样,一概地将结禅定印的如来像都认定为毗卢遮那。但是在西藏,极乐净土图中的本尊为结禅定印的如来形阿弥陀佛,与以菩萨形为本尊的本作品不同。另一方面,作为唐代八大菩萨的作例,有日本香川县开法寺的板雕阿弥陀曼荼罗,这里的阿弥陀如来也是结弥陀定印的如来形。

又,台座左右所绘的狮子,与本文列举的其他作例相同,本尊不是阿弥陀,而很可能是胎藏大日。为什么这么说呢?据五佛鸟兽座的规定,阿弥陀台座上不应该画狮子而应该画孔雀。而且吉美美术馆藏金刚界五佛(MG.17780)可以为证,说明了在敦煌曾广为流行。

又,在现今的西藏,尽管胎藏大日的作例不多,但是,现在仍然有众多佛教信众的贝沟文成公主庙本尊,被称之为毗卢遮那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拉托纳祇厘(Ratnagiri)第5祠堂像的成立年代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宫治昭教授以之为8—

9世纪。马兰多拉女士认为,埃罗拉第12窟的时代应该是在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ashtrakuta)大规模地开凿印度教石窟之前,即公元8世纪中叶。

关于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传播吐蕃的时期,将之放置在桑耶寺创建的8世纪后半叶,到雕刻昌都、贝沟摩崖佛的公元9世纪初叶期间似较为稳妥。

另外关于桑耶寺,传说是根据印度的奥丹塔普利寺院的建筑为范本所建。此时,关于寺院内的佛像选择,有没有参照奥丹塔普利的佛像尚属不明。不过,从中也可以证明当时的印度也流行以释迦或毗卢遮那为本尊,并配有八大菩萨的造像形式。

又,在本书第9章试论的八大菩萨的解析中,与印度和西藏同时期的作品相比较,毋宁说本作品的配置与瓜州榆林窟像相一致。这一事实,暗示着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图像在吐蕃占领之前的丝绸之路地区已有流传。将本作品与瓜州榆林窟像以及胎藏大日八大菩萨佛龕相比,可以从中看出传自印度图像的衰退和汉化的形成,所以说作品的成立年代不会太早。关于西藏语的尊名误记,是因以观音、金刚手安置在本尊右左的吐蕃式配置法,来解释丝绸之路式八大菩萨所致。

总结以上,本作品的成立年代位于吐蕃占领下的公元8世纪末叶至9世纪中叶,图像是当时的印度、丝绸之路地区流行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在现阶段,这一解释应该说是最为稳妥的。

附记:本文译自田中公明著《敦煌 密教と美術》第2章“敦煌出土の胎藏大日八大菩薩像”。法蔵館,2000年10月。

在西藏,由于阿弥陀如来的弥陀定印与胎藏大日的法界定印没有明确的区别,所以不能以印相来区别两者。

参见前掲宫治昭《インドの大日如来の現存作例について》第10页。